

# 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蕴

苑仲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06)

**摘 要:** 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责任。近代以来, 众多名宿从不同学科、维度和层次围绕文化主体性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人, 揭示并阐发了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学涵义。群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 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方法特质。群学研究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主要体现在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

**关键词:** 群学研究; 文化主体性; 群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 C91; F2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5)04-0065-10

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主体性则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不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步伐。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 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sup>[1]</sup> 2022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2]</sup> 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3]</sup> 由此可见,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们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战国时期由荀子创立的群学, 堪称“中国古典社会学”。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珍贵遗产,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绚丽瑰宝。近年来, 以景天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人, 围绕群学开展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成果, 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然而,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群学研究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学理关系的论述却颇为鲜见。鉴于此, 本文尝试在厘清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及社会学涵义的基础上, 揭示群学的理论品格和方法特质, 进而探究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蕴。

收稿日期: 2025-02-28

作者简介: 苑仲达(1980—),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 一、文化主体性的学理阐释

### (一) 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

谈及“文化主体性”,首先应搞清楚什么是“主体”,其次应弄明白什么是“主体性”。所谓“主体”,是与客体形成相互对待、相互依存、互为中介、共生并存关系的一种对象性范畴;而所谓“主体性”,是指在一种对象性活动中所产生和发挥的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创造性<sup>[4]</sup>。从本质上讲,主体性是一种探讨人与对象,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概念<sup>[5]</sup>,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去把握客体的一种特性”<sup>[6]</sup>。而深刻理解“主体”和“主体性”,正是科学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是有别于“他者”、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仅限于文化艺术范畴,广义则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范畴<sup>[7]</sup>。其突出表现为: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创化<sup>[8]</sup>。它的确立和巩固,是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

近代以来,众多前辈围绕文化主体性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例如,毛泽东同志主张:“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sup>[9]</sup>,”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sup>[10]</sup>。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sup>[11]</sup><sup>3</sup>,”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sup>[11]</sup><sup>29</sup>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文化意义上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侯外庐提倡,学术研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sup>[12]</sup>。张岱年认为“建设未来的中国的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sup>[13]</sup>这两位先生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的实践指向,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关怀。先贤哲人对文化主体性问题的求索与省思,为人们探寻和追问何谓“文化主体性”展示了多元面向并带来了深刻启示。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文化主体性的含义进行了持续探究。例如,江宁康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由民族的全体成员一致认可并共同维护的主体性意识<sup>[14]</sup>。楼宇烈提出,文化的主体意识是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sup>[15]</sup>。所谓“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既能自觉自省,又能自尊自重,且在此基础产生积极的适应性与创造性”<sup>[4]</sup>。刘同舫、杨文圣等将文化主体性视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表征<sup>[16-17]</sup>。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三个特征<sup>[18]</sup>。由是观之,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文化主体性”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对其实质的认识渐趋深化。

### (二) 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学涵义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费孝通先生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可谓独树一帜且发人深省。20世纪三十年代以降,费孝通基于史禄国、潘光旦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积极探索和不懈追求。1997年,费孝通提出了与“文化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概念。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sup>[19]</sup>,即弄明白“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sup>[20]</sup>。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目的就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sup>[19]</sup>。对于这种“自主的适应”,“既可以理解为发掘本土文化中与现代性规律相契合的要素,依据本土文化来重建现代化道路,亦可以理解为在本土文化与现代性要求无法结合的情境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在参与中重建自身文化个性。”<sup>[21]</sup>可见,费孝通所谓的“适应”包括双重涵义:一是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契合点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二是当两者不相容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通过学习、创新,主动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重建自身的文化<sup>[22]</sup>。在此,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阐述主要依据对“文化自觉”的定义。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历来是费孝通思想一贯的主题<sup>[18]</sup>。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23]172</sup>,其目的是“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sup>[23]223</sup>。他指出,“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sup>[23]396</sup>其中,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自主地位”“自决权”“自主权”,正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主体性<sup>[24]</sup>。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取。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sup>[23]172-173</sup>进而,他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sup>[23]173</sup>由此可见,费孝通把“文化主体性”看作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的能动和理性认知<sup>[25]</sup>,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甚或敏锐的先见之明。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费孝通坚信它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这是他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坚持文化主体性的一个突出表现。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和追问,引发了许多社会学者的反思与共鸣。例如,苏国勋的“文化自主性”、刘世定的“学术自觉”、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洪大用的“实践自觉”、周飞舟和黄家亮的“方法自觉”、景天魁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sup>①</sup><sup>[26]</sup>、赵旭东的“文化主体”、刘亚秋的“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学的“主体化”等。景天魁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以增强文化自觉为必要前提<sup>[27]</sup>。他认为,对于社会学而言,文化自信就是学科自信,它是一种“学术主体性”,即秉持“中国本有社会学”的坚定信念,并树立承担学科使命的自觉意识<sup>[28]</sup>。可以预见,“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必将紧随时代步伐与学术跃升而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和意义。

## 二、群学的理论品格和方法特质

晚清时期,“群学”具有三种含义:一是合群立会之说,二是社会学,三是广义社会科学<sup>[29]</sup>。而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人曾指出,荀子群学乃是中国自古已有的社会学<sup>[30]</sup>。费孝通也多次提及,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论断,即早在战国末期,荀子已创立了社会学<sup>[31]</sup>。另外,丁克全<sup>[32]</sup>、卫惠林<sup>[33]</sup>、牟钟鉴<sup>[34]</sup>等也有类似主张。近年来,景天魁带领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指出,由荀子创立并绵延两千多年的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sup>[35]</sup>,其核心是凝聚的群体观。这在思想观念层面否定了中国历史上只有“社会思想”而没有“社会学”的谬论,批驳了中国社会学只是“舶来品”而没有“学科史”的偏见,确证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与“历史绵延性”<sup>[36]</sup>。这些论断对于群学学术贡献的重新评价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逐本溯源,无疑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学术正声。

### (一) 群学的理论品格

从学科范围来说,群学是一套研究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学说<sup>[37]</sup>。就群学的要义而言,涂可国认为其包括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群居和一

① 景天魁指出,“学科自信”是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和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思致相因的概念,而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具有学科起源、学科历史、学科性质、学科道路和学科使命等五方面含义,它在实质上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

的社会理想论和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理论<sup>[38]</sup>;景天魁则将其概括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sup>[39]11</sup>,他对群学四个层面的凝练和升华,对于群学研究起到了基础性和纲领性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曾断言,“内之于己,变化气质,外之于人,开广智识,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sup>[40]</sup>严复也说“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sup>[41]38</sup>这不仅肯定了群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凸显了群学的实践价值。景天魁进一步指出,群学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此“四群”分别是群性在“分”“义”“礼”“和”的基础上逐层展开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sup>[42]</sup>。具体来说,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即群学元典“一线四层”的基本格局,由纵向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条主线,与横向的修身(合群)、齐家(能群)、治国(善群)、平天下(乐群)四个层次所构成<sup>[43]</sup>。他认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四个原理,蕴含着群学的根本价值<sup>[30]</sup>。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基因”,群学的要义构成了一具至大至微之理、至高至伟之功的“群学”及“群道”<sup>[44]</sup>。由此可见,群学元典“一线四层”的基本格局奠定了群学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核心,正是蕴含在群学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基本原理之中<sup>[45]</sup>。这“四群”之于人是安身立世之根本,之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之于民族是繁衍绵延的基因,之于国家是繁盛强大的密码<sup>[36]</sup>。目前,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已经日臻完善,但群学的理论体系亟须加快构建。

严复确认了群学的诚正修齐治平之事与西方社会学的“节目支条”“不期而合”<sup>[41]8</sup>,梁启超论证了群学“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sup>[46]</sup>。在此基础上,景天魁进一步揭示了它们研究对象“正同”、研究领域“暗合”<sup>[42]</sup>,研究内容“正同”、研究方法“暗合”<sup>[35]</sup>,问题意识“正同”、基本概念“暗合”<sup>[30]</sup>。尤其是在研究对象上,由于“群”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群学将人作为中心和主体,重点研究人们之间“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sup>[42]</sup>。“人本位”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物化”的“群”、抽离了人性的“群”,而是人-群一体的<sup>[47]</sup>。换句话说,群学类似于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关系、社会事实、社会变迁,但更讲究以人本位和主体<sup>[42]</sup>,这充分展示了群学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

群学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为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观照社会现象,关切社会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抱负,矢志于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新命题、新观点、新理论,彰显群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从而研究回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而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 (二) 群学的方法特质

总体而言,群学兼具研究对象的人本性、研究方法的整合性、研究视角的贯通性和研究目的致用性,而这四个基本特性共同构成了群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性<sup>[39]12-15,87</sup>。从群学的基础性概念来说,“群”是基础性构成、“伦”是基础性结构、“仁”是基础性规范、“中庸”是方法论基础。这四个概念所体现的群学基本特性,是中国社会学固有的特质<sup>[48]</sup>。

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相似之处,在于其实证性。例如,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认为,荀子群学在儒家学派中最鲜明地呈现出“社会学色彩”<sup>[49]405</sup>,其思想范式基于“自然的实证化技术”的导向<sup>[49]421</sup>;李约瑟则指出,荀子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其观点显得尤为“实证化和技术化”<sup>[49]421</sup>。景天魁认为,荀子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参验”“可稽”“解蔽”等,与“实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含义<sup>[28]</sup>。荀子正是依托“解蔽”的方法论实现了理论“大综合”,进而完成了创立群学的壮举<sup>[30]</sup>。

而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中西逻辑思维的各自特征。荀子指出“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sup>[50]</sup>其中,“以类行杂”,即从整体上把握复杂事物,相当于“整合”;“以一行万”,即用统一的原则统摄万物,也就是“贯通”。总起

来说,可谓“整合-贯通”逻辑<sup>[43]</sup>。这种逻辑具有连续、积累、叠加、嵌套的特点<sup>[36]</sup>,乃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sup>[42]</sup>。相比之下,西方的思维逻辑是“区隔-取代”逻辑<sup>[36]</sup>。景天魁强调,“整合-贯通”逻辑与“区隔-分析”逻辑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sup>[43]</sup>。

一方面,群学的整合性体现为诸多层面的统一性。群学不仅比西方的解释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更具“实证性”,而且比许多西方社会学学派更具“综合性”<sup>[30]</sup>。其主要特点是“群”具有研究对象和行动主体的双重属性,“群学”表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与功能的高度统一<sup>[43]</sup>。景天魁指出,群学所主张的“四群”彰显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眼前与长远、实在与非实在的统一性<sup>[45]</sup>。群学蕴含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人与物、外在与内在、理性与感性、描述与解释、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层面。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元典<sup>[42]</sup>。

另一方面,群学的贯通性主要体现为融通主义方法论。景天魁认为,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并非取代与被取代、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的、能够会通的<sup>[30]</sup>。社会学的融通主义,主要意指时间维度的“古今贯通”和空间维度的“中西会通”。在景天魁看来,荀子创立的群学本就注重融通,它既与古代经典纵向贯通,也与诸子百家横向会通,其在历史上积累的融通经验堪称典范。因此,融通正是群学的处世之道、应变之道和复兴之道。从实质上看,群学融通主义传统构成了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sup>[51]</sup>。相对而言,它在文化立场上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甚至是“全盘西化”。因此,群学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自主创新提供独特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研究进展来看,目前关于群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系统性梳理与体系性构建还较为薄弱,亟须学术界进一步开拓进取。

群学的方法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为根基,希冀融通古今,力求学贯中西,无论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致力于探索新范式、新方法、新技能,总结新实践、新经验、新模式,提升群学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以“整合-融通”的思维逻辑推动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进而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丰沛的智识源泉。

近年来,群学研究的主要路径是:先构建概念体系,再构建命题体系,进而形成理论脉络。其特点在于力求“多元一体”,即在多元理论中寻找“共同点”,并以其作为“整合点”,实现多元理论的一体性、融通性<sup>[45]</sup>。群学所主张的社会和平安定、义利有序兼顾、群己和谐幸福、家国同舟与共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sup>[52]</sup>。总体而言,正是群学上述理论和方法的特色与优势,使其具有震古烁今的成就和经世致用的功效。而如何通过加强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

### 三、发挥群学研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 (一) 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sup>[3]</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历史演进逻辑和文化发展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sup>[3]</sup>这不仅彰显了坚定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揭示了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不仅阐明了其新的价值意义,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从本质上看,“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sup>[53]</sup>因此,我们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勇于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sup>[3]</sup>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战国时期荀子创立的群学,不仅是灿烂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被人们称为“群学元典”的《荀子》一书可谓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之大成,而且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如“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整合-贯通”式的群学内在逻辑堪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景天魁指出,群学是中华民族缔造优秀文化和伟大文明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的一种“学术升华”<sup>[42]</sup>,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能够给出整体性、系统性解释的“学术瑰宝”之一<sup>[30]</sup>,它蕴含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密码<sup>[45]</sup>。因此,群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加强群学研究,传承群学蕴含的中华文化要素,发掘群学秉承的中华文明基因,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 (二) 深入推进“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sup>[3]</sup>其中,“结合”是指“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sup>[3]</sup>。进一步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3]</sup>由此可见,“两个结合”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sup>[54]</sup>,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sup>[18]</sup>。就社会学而言,“两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古典群学相结合。

景天魁曾指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迎来“社会学的春天”<sup>[55]</sup>。在方法论意义上,“两个结合”的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群学的融通主义,正是以群学的“融通性”消弭学术研究“古今中西”之区隔。可见,群学是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学术典范,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这就要求社会学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社会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而在社会学研究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古典群学相结合,即同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 (三) 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sup>[56]</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sup>[3]</sup>。这进一步体现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极为重要且殊为紧迫。而群学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要义,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有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掘和有效利用群学资源,持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57]</sup>景天魁的研究团队在思想史和学科史意义上,系统阐述了自古至今荀子群学大致经历的演变过程,即群学元典、群学制度化、群学民间化、群学心性化、群学转型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应有贡献。群学相态演进过程的阶段性与叠加性相统一,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机勃勃、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内在机理<sup>[36]</sup>。在这些过程中,群学与中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同频共振。故此,群学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中国古典群学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巩固文化主体性。

#### (四) 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sup>[3]</sup>。具体而言,“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sup>[1]</sup>其中,“自身特质”生动体现出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对“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正如费孝通所说,社会学恰是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学科<sup>[58]</sup>。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论,巩固文化主体性意味着要高度重视社会学的人文性,大力提升社会学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文化意义上形塑“坚定的自我”,从而充分体现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近年来,在景天魁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群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颇为丰硕的成果:一是概括了群学的精髓和要义,二是搭建了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三是构筑了群学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框架,四是指明了群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五是梳理了群学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景天魁指出,群学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sup>①</sup><sup>[35]</sup>奠定了学术史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学理支撑。它既是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百家争鸣”的学术高峰<sup>[42]</sup>。由此,群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sup>②</sup><sup>[28,59]</sup>。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我们应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其丰富的学术宝藏,持续加强群学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以实际行动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 四、结论与讨论

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sup>[60]</sup>。从理论上讲,“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中国学术界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诸多学科对其含义的理解莫衷一是,尤以社会学家费孝通对其内涵的解读颇具思想穿透力和学术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从实践上看,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

① 景天魁提出,所谓“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指:以群学的古今贯通为纵轴,以中西社会学会通为横轴,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基础,以社会学中国化为方向,交汇融通、综合创新,形成一系列能够回答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的伟大创造过程。

② 景天魁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学术的复兴,“群学复兴”就是要争取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对话的话语权。

性,既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力抓手。为了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把中华文明瑰宝中的群学发扬光大。

群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一方面,群学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基本原理和逻辑架构,搭建了一整套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展现了其包罗万象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群学以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为方法原则和实践导引,促进了古今中西社会学的交汇融合,彰显了其历久弥新的方法气韵。正因如此,群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方法特质,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强大学术支撑和不竭智力支持。

历史和事实证明,拓展和深化群学研究,充分发挥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对于更好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实现群学复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群学是一个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必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加强群学研究巩固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贡献智慧和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01).
-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 2022-04-26(01).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4] 郝书翠. 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迷失及其学理背景[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13-116.
- [5] 王让新.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J]. 党政研究, 2023(6): 36-43.
- [6] 沈晓珊, 李林昆. 主体性概念试析[J]. 哲学动态, 1991(8): 20-23.
- [7] 管宁.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82-95.
- [8] 付长珍. 文化主体性与民族独特性——兼谈中国文化形态的当代建构[J]. 探索与争鸣, 2014(10): 32-35.
- [9] 毛泽东.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M]//毛泽东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92.
- [10] 毛泽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M]//毛泽东文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77.
- [11]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侯外庐. 韧的追求[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107.
- [13] 张岱年. 关于文化问题[M]//张岱年全集: 第6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200.
- [14] 江宁康. 略论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J]. 兰州学刊, 2004(3): 221-222.
- [15] 楼宇烈. 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N]. 光明日报, 2007-01-11(10).
- [16] 刘同舫.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 4-10.
- [17] 杨文圣, 蔺雨.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四维意蕴[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1): 39-49.
- [18] 陈方刘.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7): 26-32.
- [19] 费孝通.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 思想战线, 2004(2): 1-6.
- [20]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 学术研究, 2003(7): 5-9.
- [21] 李友梅. 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0(4): 2-19.
- [22] 梁仲明, 周敬蓉. 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析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J]. 理论导刊, 2019(3): 10-14, 21.

- [23] 费孝通. 文化的生与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林默彪.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2): 159-166.
- [25] 麻国庆. 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J]. 求索, 2019(2): 4-12.
- [26]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 概念的提出、含义与实质[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55-61.
- [27] 景天魁, 王君柏.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访谈[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5-13.
- [28] 景天魁. 中国古典社会学的近代命运[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2(6): 41-65.
- [29] 姚纯安. 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03(5): 15-24.
- [30] 景天魁, 魏厚宾. 群学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J]. 人文杂志, 2022(9): 1-14.
- [31] 费孝通. 从实求知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32.
- [32] 回清廉. 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传略[J]. 回族研究, 1992(1): 97-101.
- [33] 卫惠林. 社会学[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0: 17.
- [34] 牟钟鉴. 荀学新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序, 4.
- [35] 景天魁. 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J]. 人文杂志, 2019(6): 1-6.
- [36] 景天魁. 论群学相态[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65-79.
- [37] 谢立中. “中国本土社会学”辨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9-15.
- [38] 涂可国. 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J]. 中州学刊, 2016(9): 108-116.
- [39]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 起源与绵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40] 康有为. 康有为学术著作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95.
- [41] 黄克武.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严复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42] 景天魁. 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J]. 社会学研究, 2018(5): 1-22.
- [43] 景天魁. 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J]. 探索与争鸣, 2019(6): 36-47.
- [44]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7.
- [45] 景天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观念[J]. 人文杂志, 2023(9): 24-39.
- [46] 梁启超.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M]//饮冰室合集: 第五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317.
- [47] 景天魁. 迈向大众社会学——追寻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塑造[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 1-13.
- [48] 景天魁. 史海拾贝: 中国社会学概念体系的历史资源[J]. 社会学评论, 2017(5): 3-21.
- [49] 本杰明·史华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50] 荀子[M]. 方勇, 李波,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26.
- [51] 景天魁. 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涵[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4): 61-78.
- [52] 景天魁, 王翰飞.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9-18.
- [5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44.
- [54]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9(01).
- [55]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J]. 学术界, 2014(9): 20-33.
- [5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 人民日报, 2022-05-29(01).
- [57]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02).
- [58]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5-16.

- [59] 景天魁.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路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5.
- [6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J]. 人民日报, 2024-10-29(01).

##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Qunxue Studie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YUAN Zhongd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 comprehensive and fundament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glorious mission and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Since modern times, many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have been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dimensions, and levels. Som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ologists represented by Fei Xiaotong, have revealed and expounded the soci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s the classical Chinese sociology, Qunxue has unique theoretical qualities and distinct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ositive role of Qunxue studies in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mainly embodied in better fulfill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s in the new era, deeply promot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ccelerating to build a Chinese sociological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revival of Qunxue.

**Key words:** Qunxue studies;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revival of Qunxue

(责任编辑: 刘 凡)